



當代亞洲研究中心
研究報告第八號

當代亞洲研究中心

在新形勢下的日本與東盟

郭炤烈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82, is one of the two research centres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The Centre was established to encourage and coordinat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Asia, especially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cholar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and other institutions are welcome to participate in the Centre's research programmes or to affiliate their independent projects with the Centre.

The Centre publishes and distributes the *CCAS* Annual Report,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and working paper series. Both Chinese University faculty and scholars of other institutions may submit manuscripts for consideration for publication. The Centre also hosts conferences on Asian studies. Through such activities the Centre strives to stimulate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exchanges among scholars of Asia.

香港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研究所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在新形勢下的日本與東盟

郭炤烈

香港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研究所

作者簡介

郭焯烈教授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

目錄

前 言

- (一) 簡要的回顧
- (二) 東盟性格的幾個表現
 - (1) 「競爭」與「合作」
 - (2) 「縱向的互補」和「橫向的互補」
 - (3) 「國家的強韌」和「地區的團結」
 - (4) 「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
- (三) 日本與東盟關係中的新情況
 - (1) 日本從東盟的工業製品進口顯著增加
 - (2) 日本的投資促進東盟的工業化
 - (3) 需要爭取與國際責任相稱的O D A
 - (4) 略論「亞太貿易自由區」設想

註 釋

本文所載內容乃屬作者個人看法，並不代表社會研究所的意見。版權所有。
任何人士未經當代亞洲研究中心書面許可，不得將本書任何部分翻印或轉載。

前言

從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八八年八月，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 A S E A N）整整已邁了廿一年的歷程。東盟是作為東南亞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地區性經濟合作機構而誕生的。但從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加盟各國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發表了關於和平、自由、中立的東南亞中立地區宣言以後，東盟更加急劇地增加了其政治性格。東盟堅持用一個聲音對外，無論涉及全區的經濟問題或政治問題，尤其是在政治性的問題上，起了非常獨特的作用。東盟在為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所作的貢獻，特別是為爭取柬埔寨問題的政治解決所作的努力和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經濟發展上，東盟成為西太平洋地區富有生機的一個發展層次，在這個地區多層次你追我趕的經濟發展結構中，二十多年來取得了迅速的發展，成為世界經濟中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七十年代，東盟國家平均經濟增長率高達7.8%，大大高於同期西方發達國家的3.2%，也高於整個發展中國家的5.1%，進入八十年代以後，雖然由於遇上世界性的不景氣和本身經濟結構上的原因，其增長速度有所減弱，甚至在中葉短期出現過陰影，但隨着產業結構的調整和世界經濟環境朝有利方向的變化，八十年代後半期又出現向上的趨勢，根據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的統計和預測，一九八六年的實質經濟增長率，印尼為3.2%，馬來西亞為1.2%，菲律賓為1.1%，泰國為3.5%，新加坡為1.8%，一九八五年這些國家出現的負增長迅速轉變為正增長，一九八七年、八八年的預測是，印尼為3.2%和3.4%，馬來西亞為2.8%和3.4%，菲律賓為4.9%和4.5%，泰國為5.7%和5.5%，新加坡為8.0%和6.3%。（註一）

作為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構成部份，東盟經濟的發展是同地區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緊密交流和合作分不開的，換句話說，是通過和地區內的南南合作以及同地區外的南南合作，南北交流中發展起來的。東盟的對外經濟合作是開放的，又是多邊的，其中值得特書的是它同西太平洋經濟地帶的發達國家日本的關係，這是因為日本是東盟極其重要的貿易伙伴，又是東盟最大的投資者，但是，日本與東盟各國的經濟關係，並不是從東盟成立才開始，而要追溯到在這很久以前。

(一) 簡要的回顧

溫故知新，要更好地理解日本與東盟今天的關係，就很有必要瞭解日本與東盟國過去的交往。戰後加入東盟的這些東南亞國家，戰前多數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曾經由於日本的「南進政策」和侵略而蒙受其害，不少被置於日本直接的軍權之下。曾被看做日本軍國主義代名詞的「大東亞共榮圈」，至今仍在人們心中記憶猶新。太平洋戰爭，以日本的慘敗而告終，日本被驅逐出東南亞各地，並被置於美國的佔領之下，戰後圍繞着日本的國際形勢變化迅速，以美蘇為兩極的冷戰日趨激化，美國為了把日本作為其在亞洲的工廠和反共的防堤，其對日佔領政策，從嚴厲到緩和，再轉為扶植，並通過舊金山對日獨獨媾和，把日本納入它對共產主義遏制政策 (Containment Policy) 的一環。

當時，舊金山體制的成立意味着日本放棄對戰前佔它對外貿易 $\frac{1}{3}$ 的中國市場，因而對日本來說很需要迅速開拓可以替代的市場，所以，在一九五二年，對日和約生效後的五月十五日，當時吉田內閣的池田大藏相就發表談話說：「為了提高東南亞民族的生活，正在考慮同美國一起進行開發。」以後的進程完全證實了日本的這一政策。「賠償」政策是戰後日本最顯著，最有效的對東南亞政策，當時對日本財政支出並不構成嚴重負擔的「賠償」(註二)，用各種資本貨物和消費品進入有關各國以後，實際上為日本在東南亞地區開拓商品市場掃清了道路。

一九六九年，日本同東盟五個加盟國的貿易總額增加到一九五九年的2.8倍。到一九六七年，即東盟成立那一年，在東盟五國對外貿易額中，除了菲律賓以外，日本已經都佔其首位。

由於東盟的成立，日本與東盟地區形成了雙重關係，一是日本同作為一個機構的東盟的多邊關係，另是日本同東盟各個加盟國之間的雙邊關係，而這種雙邊關係則無論東盟成立與否，一直在向前發展着。早在六十年代初，日本在東盟地區貿易中所佔比重已經達到美國的水平，其後美國由於越戰不利而從這個地區後退和日本的取而代之，到當時的日本首相福田起夫發表要同東盟「心心相印」的「福田主義」的一九七七年，即東盟成立十年後，無論是出口或進口，日本已成為東盟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這一年(一九七七年)據IMF的統計，在東盟地區總出口中，日本佔24.6%，超過美國的21.6%和E.C.的14.5%。同年，在東盟地區總進口中，日本佔23.8%，同樣遠遠超過美國的13.7%和E.C.的14.7%。(註三)

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是從一九五一年開始的，但急劇增長的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從一九五一年度到一九七七年度末的日本民間海外投資共有221.1億美元，其中佔28.6%的63.3億美元是以亞洲地區為對

象的。東盟是46.8億美元，佔總額的21.1%，佔對亞洲地區投資中的74%。日本成了東盟的最大投資者，早在一九七一年，在東盟接受外資比重中，日本就佔33%，超過了美國的23%。(註四)

東盟地區也是日本政府投資的重點地區，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八年的累計額看來，日本的政府的開發援助(ODA)總額3.5億美元中的39.3%是以東盟地區為對象的。在同一時期，東盟所接受的ODA中主要供應國所佔的比例是，日本為39%，遠遠超過美國的29%和E.C.的21%，成為在東盟地區最大的政府資金供應國(註五)。日本利用這些資金，分別對東盟各國單獨工業項目和東盟共同工業項目提供了援助，對東盟各國的工業化起了作用。

但是，日本與東盟的這種合作，不僅為東盟所需要，而且為日本所需要。因為日本需要東盟地區豐富的各種資源，需要東盟市場，希望通過東盟海域的海上運輸線能夠得到安全，希望共同反對霸權擴張而爭取為經濟繼續發展所不可缺的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因此，日本與東盟關係的發展是互有需要的，而且對有關各方都是有利的。

(二) 東盟性格的幾個表現

東盟在處理對外關係上，無論是政治問題或經濟事務都是堅持用一個聲音對外，並且在政治領域裏取得了頗為可觀的成效。但是，由於加盟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多樣性，內部卻存在着許多矛盾，而這些矛盾的發展和演變，直接、間接地影響着，甚至左右着它們與地區外國家的關係。

(1) 「競爭」與「合作」

東盟成立後，這個標榜地區性經濟合作機構的地區內部的經濟合作無疑是有進展的，但無論從速度或規模來說都不及同地區外部的經濟合作。這是因為東盟國家不僅在經濟發展階段上屬於同一層次，而且在產業結構，產品結構方面都有不少相同之處，因此在合作中有競爭，而且各國為自己的產品尋求市場，特別是日本以外的發達國家市場的競爭甚至是非常激烈的。雖然東盟各國為了削減關稅，推行區域內的合作，於一九七七年二月簽訂了《東盟特惠貿易安排協定》(ASEAN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 PTA)，根據這個協定可以享受特惠的商品項目不斷擴大，免稅率也不斷提高，但其貿易量並沒有擴大很多，這是因為享受特惠貿易待遇的產品大多不是各國的主要產品，而且在地區內貿易中所佔的比率很小，為了保護自己的市場，各國都保留了一批自己的主要的傳統產品，使它作為保護性的「敏感性」產品而不享受特惠關稅待遇。

(2) 「縱向的互補」和「橫向的互補」

東盟各國的經濟幾乎都是貿易型的，無論在地區內貿易或地區外貿易中，都有互補性。地區內的貿易屬於南南合作的範疇，雖然產品中有些部份（尤其是初級產品）是相似的，但總的來說，在初級產品之間，在初級產品和工業產品之間，在工業產品之間，都還有很多可以互通有無的餘地，即有發展「橫向互補」的餘地。但是，東盟各國同地區外國家，特別是中國日本之間的「縱向互補」關係，比起東盟各國之間的「橫向互補」關係大得多。「縱向的互補」屬於南北合作的範疇。從日本方面來說，需要各種資源、能源，需要相對廉價的工業製品，同時也需要商品市場和投資市場。從東盟各國來說，需要出售初級產品，加工產品和其他工業製品，換取外匯購買工業化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和各種中間材料。同時為了發展經濟，需要引進外來資金和先進技術，如果不首先重點地發展這種「縱向的互補」關係，就無法在你追我趕的經濟格局中立足。為甚麼地區內部的經濟來往進展緩慢，地區外的來往，特別是與地區外大國的來往發展迅速，規模不斷擴大的原因就在於此。

(3) 「國家的強韌」和地區的團結

東盟地區這些曾遭受殖民主義統治的國家，渴望政治上的解放和經濟上的獨立，希望國家的強韌 (National Resilience)，因此對自己國家的強大和經濟上的發展是十分關心的。戰後，它們大多數都是走上了投資主導型，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發展道路。相對地說，東盟各國大多是小國或者弱國，為了使本國得到強韌，還需要整個地區的穩定和繁榮來作為依托，因此也提出了「集體自力更生」等口號。東盟成立以後，在工業合作領域裏，推行了兩種發展計劃，一是民間合作企業性質的工業互補計劃 (ASEAN Industrial Complementation Scheme, AIC)，另是政府主導型的東盟合資經營的大型計劃 (ASEAN Industrial Projects Scheme, AIP)。一般說來，投資者，都有這樣的共同目標，即考慮到各國市場的局限性，由加盟國分工籌辦某一產業，產品由整個地區來加以消化，以求批量生產，降低成本、增加就業，享受特惠，節省外匯，發展工業。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東盟各國又簽訂了「東盟工業聯營計劃基本協定」(ASEAN Industrial Joint Venture Scheme, AIJV)，允許兩個以上的東盟成員國同非成員國投資者聯合舉辦工業企業。到一九八七年底已經有九個項目的產品被批准為東盟工業計劃下的特惠產品。雖然東盟地區內部的工業合作也有進展，但步伐不快，當加盟國的國家利益高於地區的團結利益時，地區的團結、合作就有可能被推到後面。就拿東盟合資經營的五項大型共同項目計劃來說吧，

一九七六年當時的加盟五國經濟部長決定在每一個成員國建立一個工業項目，日本曾經為此承諾了十億美元的貸款，如果這些工廠都建成，無疑可以增強東盟的工業實力，但至今只有印尼和馬來西亞的兩個尿素工廠尚有進展外，其餘的不是遇到困難就是乾脆被取消。例如東盟經濟部長決定在新加坡建設的柴油機廠，由於印尼的反對而被取消，因為由於新加坡的柴油機廠建成，這個廠的產品就要在效率，質量等各方面都超過印尼的同類產品。

(4) 「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

根據東盟的申請，從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二年聯合國調查團進行了調查，並提出了關於東盟地區內經濟合作的報告，其中作為主要的建議，提出了貿易的自由化，內容是想在一九九〇年以前撤除地區內的所有關稅和數量上的限制。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的第一次經濟部長會議提出了如下的建議：到一九九〇或者二〇〇〇年以前建立自由貿易區，自主撤除進口數量的限制。由於東盟各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持有不同的經濟利益，所以對自由貿易區構想有很不相同的看法和態度。新加坡因國內市場容量小，但工業比較發達，產品競爭力強，並在地區內部貿易中佔有壓倒多數比重，所以對自由貿易區構想表示最積極。國內市場大，工業化比較慢的印尼則對自由化表示積極，印尼希望繼續利用一定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來保護本國的利益。因此，當新加坡和菲律賓、泰國同意將互相之間所有的貿易商品項目降低10%的關稅時，印尼卻認為過早的自由化對印尼是不利的。提到東盟時，往往會聯想到歐洲共同體，但這兩個是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兩種組織，歐洲共同體是工業生產達到大抵相同水平的西歐發達國家的聯合。正以一九九二年為目標，在貿易、資金流動及人的流動上全部消除共同體各國之間的障壁。與此不同，東盟是東南亞地區發展中國家的鬆散的聯合，各國之間的經濟差別和類同的產業、產品結構造成了地區內經濟合作的障壁，離共同市場尚遠。

東盟性格的上述幾個發現，不僅影響着地區內的相互合作，也影響着它們與地區外國家，尤其是與大國之間的經濟關係。談到東盟與日本的關係時，這些因素不但在過去的關係中起過作用，而且在現在的，特別是在八十年代後半期的關係中正在起着特殊的作用。

(三) 日本與東盟關係中的新情況

(1) 日本從東盟的工業製品進口顯著增加

對東盟來說，日本長期以來是它最大的貿易伙伴，一九八七年日本在東盟的對外貿易中日本所佔的比重是20—25%，超過美國的18.5%和地區內貿易的16.5%。另一方面，對日本來說，東盟各國是次於美國，歐洲共同體的第三個貿易伙伴。(註六)日本對東盟的出口由於受到八十年代前半期東盟地區經濟增長的減速和日元急劇升值的影響，呈現減少趨勢。日本從東盟的進口額也由於石油等初級產品價格的下跌而有所減少，但工業製品的進口卻顯著增加了。根據日本興業銀行的統計，日本從東盟國家的工業製品進口，一九八六年上半年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6.9%，一九八六年下半年增加14.9%，一九八七年上半年急增47.6%。(註七)這是因為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由日本逐漸擴大到西太平洋經濟地帶的結果。日本是東盟最大的出口市場，但從商品結構來看，主要是初級產品，而就工業產品來說，過去的日本市場也是很難打進去的地方。對東盟來說，最大的工業製品出口市場還是美國，但近年來美國的貿易赤字居高不下，不但與日本的貿易摩擦加劇，而且逐漸波及亞洲 NIES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和東盟。美國官員，包括國務卿舒爾茨和一些政府貿易官員一再表示，東盟的工業製品不能過多地依靠美國市場，而應開拓日本，西歐等市場，並以廢除特惠關稅相威脅。在美國的這種壓力下，東盟不得不把目光轉向日本。同時，由於日元升值，東盟的一些工業產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比日本的國內產品有更多的競爭能力，並迎合日本的需求擴大，所以東盟的許多工業製品大量湧進日本市場。在日本與東盟的貿易關係中，東盟的工業製品以較大幅度的比率迅速在日本的進口商品結構中增加，是東盟成立以後首次的新情況。這種新情況，對日本與東盟的國際分工怎樣從傳統的垂直分工發展到新的水平分工有利，對東盟各國的工業化進程有利，對日本緩和對美經濟摩擦有利，對日本調整產業結構有利，對日本與東盟建立新的合作關係，對調整南北關係都是有利的。新情況提出了新課題。從日本來說，需要更加開放從東盟進口工業製品，鑒於日本和東盟的重要關係，應該取消歧視性的關稅口率，同時鑒於東盟內部存在的競爭現象，應該兼顧各有關國家的不同利益，適合平衡進口，促進東盟國家工業化的進程，據報導，今年七月間在曼谷舉行東盟第廿一屆外長會議時，在東盟和美、日、加、新、澳、E.C.等外長的對話中，東盟向日本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要求日本增加對東盟商品的特惠貿易，要求日本減少對東盟商品進口稅，要求增加在東盟工業部門的投資。就東盟各國而言，

為了擴大一些製品的對日出口，需要提高產品質量，增加商品的國際競爭能力，從這裏可以引出另一條新課題，即東盟需要進一步從日本引進資金和先進技術。

(2) 日本的投資促進東盟的工業化

日本的對外投資，隨着其經濟實力的增長而一直在增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自從一九五一年以來已有幾次投資高潮，第一次出現在一九七一至七二年，第二次出現在一九八一至八四年，並於一九八四年突破了100億美元的大關而達到101.5億美元，第三次高潮出現於一九八五年至八六年，一九八七年度又與上一年度相比增長49.5%，而達到333.64億美元。(註八)衆所周知，東盟一直是日本的重要投資市場，雖然八十年代前半期日本對東盟的投資有所下降，但從一九八六年下半年起又開始回升，日本對泰國的投資尤其顯著，僅一九八七年一年，日本企業在泰國投資的計劃數額就超過了以往廿七年(即從有統計數字的一九六〇年開始到一九八六年爲止)的投資總額。(註九)由於美元貶值，日元升值後，日本的勞動力成本以美元計算大幅度提高，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所以日本把處於劣勢的企業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外地區生產，從那裏再向第三國市場出口或者返銷，在經濟上是有利的。因爲東盟的勞動力價格相對較低，技術水平又相對較高，可以就地找到原料，離日較近便於反銷，而東盟本身也有引進外資，發展經濟的需要，所以日本的資金就大量湧向東盟。這次向東盟的投資高潮，有一個顯著的特點，是把日本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東盟各國振興工業緊密地結合起來的。這樣，就不是停留在市場開拓型或確保資源型的投資。新形勢下，日本對東盟的這種投資，對日本緩和日元升值帶來的壓力有利，對向國際協調的方向調整日本產業結構有利，對東盟國家振興經濟增強國力有利，對調整南北關係，加強經濟合作，發展西太平洋地區的經濟也是有利的，隨着日本對東盟國家投資的增加，東盟各國也理所當然地要求日本轉讓先進技術。過去，日本在轉讓技術方面是較保守的，甚至提出要在技術上同後進國家拉開一段距離，因而受到國際上的非難。這就給日本提出了一個課題，如何妥善地解決技術轉讓問題。技術轉讓的問題是涉多方面的複雜問題，看樣子不是一廂情願可以解決的。但是，如果這個問題解決得好，解決得妥當，對後進國家的經濟發展肯定是很利，技術的進步促進生產的發展，增加國力，提高人民購買力，擴大市場，從而對發達國家的繼續發展是有利無害的。如果說，發達國家要對發展中國家負起國際責任，對國際社會作一些貢獻的話，那麼技術轉讓便是一個重要方面，其實，在發達國際分工——改善南北關係，求得共

同發展和共同繁榮都是有利的。在技術更新周期不斷縮短和技術出讓競爭十分激烈的今天，誰想壟斷技術，封鎖技術都是不容易的，同時也是不明智的。

(3)需要爭取與國際責任相稱的 ODA

東盟一直是日本對外經濟合作的最重點地區，在日本的兩國間政府開發援助 (ODA) 中佔30%左右。對東盟各國來說，日本是它們最大的援助國。日本的 ODA 是隨着日本國力的增強而增加的。一九六〇年，日本的 ODA 是1.5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的 $\frac{1}{27}$ ，到了一九八六年增加到56.34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第一位的美國為97.84億美元）。一九八七年，日本的 ODA 增加到74.53億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32.3%，援助額在GNP中所佔比率從上一年的0.29%上升到0.31%。（註十）日本政府最近決定，到一九八二年將把ODA對GNP的比率提高到0.38%—4%，相當於DAC (OECD) 開發援助委員會成員國的平均水平，但仍然低於國際目標的0.7%。（註十一）一九八六年的0.29%的含義是日本 DAC 十八個成員國中居第十五位。這裏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正如國際上所批評的，日本還沒有作出經濟大國相稱的貢獻，ODA主要是用來整備受援國的基礎設施和投資於興辦大型項目的，東盟合資經營的大型共同項目就是其中之一。日本用ODA在東盟地區進行的基礎設施，實際上是同日本民間投資配合起來進行的，為民間企業打入該地區開辟道路，同時也意味着各種成套設備的出口。因此，日本在提供援助的同時，本身也是受益的，如果再加上受援國經濟發展後反饋回來的經濟利益，那麼日本的受益將是更大的。考慮到這些，日本作為經濟大國，為了盡它應盡的國際責任，應該在數量和質量上改善ODA，數量上應該以聯合國規定的0.7%為目標，盡快地提高ODA對GNP的比率，在質量上，提高贈與比率 (grant element) 和改善貸款條件（如降低利息，延長償還期限）等。在ODA的提供方面，還需要考慮受援國的實情，不但要照顧工業，也要照顧農業、漁業、文化教育、衛生等，既要照顧大型的，也要照顧中小型的，同時還有必要平衡受援國的需要，既滿足受援國的需要，又要維護它們之間的團結。

(4)略論「亞太貿易自由區」設想

當前圍繞着東盟地區的經濟活動，正在世界範圍內展開着。東盟地區各國，無論在本地區內還是同西太平洋地區或世界各地的相互依存關係正在深化，大有超越國界之勢，但同時也正在醞釀着另外一種意識即世界的經濟集團化趨勢。在北美、美國與加拿大於今年一月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

美加兩國間的貿易量超過日美貿易，美加成為當前雙邊貿易中世界最大的伙伴。根據美加自由貿易協定，美加之間的關稅原則上十年之內取消。對這種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 的「多邊、自由和無差別」原則不相同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美國總統里根解釋說：「美加協定並不是在北美建立經濟集團。原來所講的自由化就是要向全球前進。但是，全球性的做法需要時間太長。要從首先能夠辦到的地方着手，打算先簽定雙邊協定，然後再擴大到世界去。」另一方面，在歐洲也正在推進一項以一九九二年為目標的E.C.內完全自由化的地區主義，這些是新近出現的新現象，是需要注意的新現象，有人擔心如果這種現象和貿易保護主義趨向結合特來，形成集團，那就將影響到全球。

在西太平洋地區，日本和亞洲NIES, ASEAN 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係，正在加深。日本與東盟的關係已在上邊說過，日本與亞洲NIES 的經濟關係在世界經濟中更為突出。對日本來說，亞洲NIES 已經成為比E.C. 更為重要的貿易伙伴，一九八四至八七年，在日本外貿中，亞洲NIES 所佔的比重從11.2%上升到15.3%（歐洲所佔的比重為14.6%）據日本貿易振興會 (JETRO) 的統計，一九八七年，來自亞洲NIES 的工業製品佔日本這類產品全部進口的28.2%。這一比率超過了來自美國的產品所佔的26.8%。而去年一年中，日本的工業製品佔全部進口的44.1%，達660億美元，比一九八六年增加了25%。（註十二）

除了貿易關係以外，因日元升值而加快的了的日本企業向西太平洋地區的移化生產，也正在促進着政治一體化的趨勢。西太平洋地區屬於幾個不同經濟發展層次的國家和地區的「你追我趕」的競爭和相互依存的關係是不斷地加深了，實際上也有慢慢地形成一個經濟圈的趨勢。對來自北美，歐洲的信息，日本好像是有些焦慮了，正在考慮對策。據日本報刊透露，竹下登首相的諮詢機構——「經濟審議會」中的「國際經濟都會」正在醞釀建立包括日本、亞洲NIES 和 ASEAN 在內的「東亞經濟國」構想，通過貿易、投資和貨幣「三位一體」的合作，促進圈內相互的經濟發展，最終實現「太平洋共同體」的目標。據日本《東京新聞》報導，日本外務省於今年五月十二日擬定了「亞洲、太平洋地區合作的展望和綜合戰略」，建議把亞洲、太平洋地區作為自由貿易的樣板地區。據稱，日本外務省表明這種設想還是第一次。（註十三）另據日本時事社的報導，研究在亞太地區發展新的經濟合作關係的日本通產省亞洲太平洋貿易研究會今年六月十三日制定了一份中期報告，認為亞太地區經濟要取得均衡發展，就應從「依附美國型發展」過渡到「分擔作用型發展」。該報告指出，日本的作用是通過擴大進口而開展經濟合作，減輕美國的負擔，並認為有必要把亞

洲自由貿易設想作為將來的課題，加以研究。（註十四）日本提出了一些建立亞洲自由貿易區設想，而這些設想在亞太地區也得到一些人的響應。新加坡總統李光耀最近在會見日本雜誌（《日經商業》）記者時說，為了牽制美國的保護主義，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西太平洋自由貿易國，「大概是有益的」。（註十五）

但是，要在西太平洋地區建立這樣的「經濟圈」，並不是輕而易舉的，分析起來，這裏既有政治的因素，也有經濟的因素。從政治上講，這個地區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於歷史的教訓，不願意接受某一大國的主宰。以日本帶頭來建立這樣的經濟圈，周圍各國包括東盟各國是存有戒心的。許多國家的政界人士對昔日的「大東亞共榮圈」記憶猶新，當一九七九年當時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環太平洋連帶構想」時，東盟各國曾經表示過冷漠。因此，以後的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太平洋合作四原則時，就把「以東盟為主導」作為一項原則。但擬議中的包括東盟地區在內的亞太自由貿易區設想卻是以日本為主導的。這兩個「主導」，如何協調不能不說是個問題，何況還存在着經濟發展層次比ASEAN更高的亞洲NIES。有人說自由貿易圈是對付貿易保護主義的、但這話很難自圓其說。因為這個地區的經濟合作一向是標榜平等的、開放的，不排他的。我認為、貿易保護主義是我們所反對的，也應該認真對付的，但擬議中的地區合作應該是開放的，向前的，不應互相損害，不但對內不排他，對外也應爭取協調和合作，否則就難免被認為是以新的保護主義對付舊的保護主義。中國是西太平洋地區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日本著名學者大來佐武郎先生(Saburo Okita)曾經說過：「着眼於亞太地區經濟發展之未來，如果中國不參加太平洋經濟合作，將會出現一個巨大的缺口」。因此，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無論要成立甚麼樣的全區性經濟合作組織，想繞開或者回避中國，不但是不現實，而且也是不明智的。從經濟上來說，西太平洋地區有幾種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共處，再加上它們在歷史、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多樣性，各國的利益是很不相同的，利害很難趨於一致。東盟在這個地區屬於較低的發展層次，矛盾更多、更複雜，目前還不可同美國、加拿大和E.C.各國同日而語。因此，在這樣的地區要推行自由貿易這構想，肯定將是困難重重的。

註釋

- (一)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頁七。
- (二) 一九六二至六五年，日本對其賠償支出負擔最重時，其年均支付額也只不過佔年度預算的2%。
- (三) 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IDE)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出版的拙著日本與東盟關係的歷史和現狀，頁十六。
- (四) 同上，頁六十一。
- (五) 同上，頁七十三。
- (六) 日本經濟與外交月刊，一九八八年十月號，頁六。
- (七) 日本興業銀行調查部小林論文「今後世界經濟的展望與西太平洋經濟圈」，頁十八。
- (八)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八年六月。
- (九) 日本東洋經濟周刊，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 (十) 時社，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電。
- (十一) 日本東京新聞，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
- (十二) 法國世界報，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
- (十三) 日本東京新聞，一九八八年五月三日。
- (十四) 時社，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三日電。
- (十五)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